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八至十三世紀明州城的發展

The Development of Ming-Chow (8-13th)

doi:10.6154/JBP.1983.2.011

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, (2), 1983

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, (2), 1983

作者/Author：吳慧蓮(Hui-Lien Wu)

頁數/Page：188-199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83/06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6154/JBP.1983.2.011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八至十三世紀明州城的發展

吳慧蓮\*

### THE DEVELOPMENT OF MING-CHOW (8 — 13TH)

by

HUI-LIEN WU\*

#### 摘 要

本文以八至十三世紀明州城的發展為例，探討地方都市發展的內在、外在原因，更藉此以見唐宋之際江南地區人口增加經濟蓬勃之一斑。

#### ABSTRACT

This article illustrated a typical exam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of Ming-Chow, during eighth through thirteen century. It has mainly discussed about interior and external key roles for the development as a model town like Ming-Chow. It probably could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facts of the increasing for its population and the prosperity for its economy during Tang & Sung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.

民國71年7月25日收稿

\*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

Manuscript received July 25, 1982

\* Graduate Student, Institute of History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,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## 前言

城市的建立、發展，必然反映著地方的開發與進步。我們從城市人口的消長、商業之盛衰，可看出地區內人口流動與產業分化的情形，而此種變遷又往往與該時代之政治、經濟情勢有關。明州，始設州於唐開元二十六年（七三八），其州治原為一蕞爾小城，到南宋時，成為數萬人之通都大邑，其發展經過頗富歷史意義，應有研究之價值。

有關明州地區的開發及都市發展，日人斯波義信，曾作過相當細密之研究，先後發表「宋代明州の都市化と地域開發」及「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」二文（註1）。然前者主要在探討唐宋之際明州地區之水利建設、產業分佈與都市化的情形。後者則多偏重於明清之際，四明地區的專業化生產、市場網的形成及清代寧波城的市況。唐宋之際，明州地區的開發、商業的興盛，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，和當時海外貿易路線的轉變、宋室的南遷，皆有莫大之關係。本文欲承斯波義信研究之餘，對明州城的發展原因、背景及城內的建置、商業做更進一步探討。俾對唐宋之際，江南地區之開發，商業之繁榮，獲致較深刻之瞭解。

## 一、地理形勢

浙江省境，除了北面杭州灣、太湖流域一帶之平原較為寬廣平坦外，境內多丘陵台地羅佈。在這塊大台地上，由北而南，分別為錢塘江、曹娥江、甬江、靈江、甌江等流域所切割，沖積而成大小不一的河谷平原，使得浙江省境的地理景觀，呈現著一種零亂而又統一的畫面。明州城，即位在數個沖積平原之一——寧波平原的中心點上。寧波平原由鄞江、奉化江、甬江及餘姚江沖積而成（註2）。西有四明山、大雷山，南為天童山、太白、小白、育王山等圍繞，其標高皆在五六百公尺至一千餘公尺之間。東為舟山群島，則以我國之漁場，及天然良港著稱。民國時，在此整建而成的海港有定海港、沈家門港、普陀港、克難港、高亭港、澀港、長塗港（註3）。可見各島嶼間，原多停泊處，適於漁民避風休息或補充淡水，因此自古即為航海技術發達之區。

明州城的地理位置，於浙江省境各港口間，雖無獨特之處，然而北面之杭州灣，以潮汐險惡之故，使船舶憚於停靠，而改由明州城上岸，沿餘姚江、運河而達於杭、越。寶慶四明志卷四敘水道：

……今觀浙江之口，起自籊風亭，北望嘉興大山，

水濶二百餘里，故海商船舶佈于上潭，惟泛餘姚小江，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。蓋以下有沙潭，南北橫亘，隔礙橫波，蹙遏潮勢。夫月離震兌，他潮已生，惟浙江水未漲，泊月經巽乾，潮來已半，濁浪擁滯，後水益來，于是溢于沙潭，猛怒頓湧，聲勢激射，故起而為濤耳，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。

錢塘海濤以今日之航海技術看來，雖不算什麼，然對帆船時代的人們來說，廣濶的河面，洶湧的浪潮，橫亘的暗沙，實潛伏著太多的危險。於此稍南的明州，沿甬江口上溯十三裡即達於城門，河深廣而水緩，無風濤之險。於此改乘小船，可沿餘姚江、運河而達於紹興、杭州城下。故自唐疏浚浙東河以後，明州城即成為蘇、杭地區重要的海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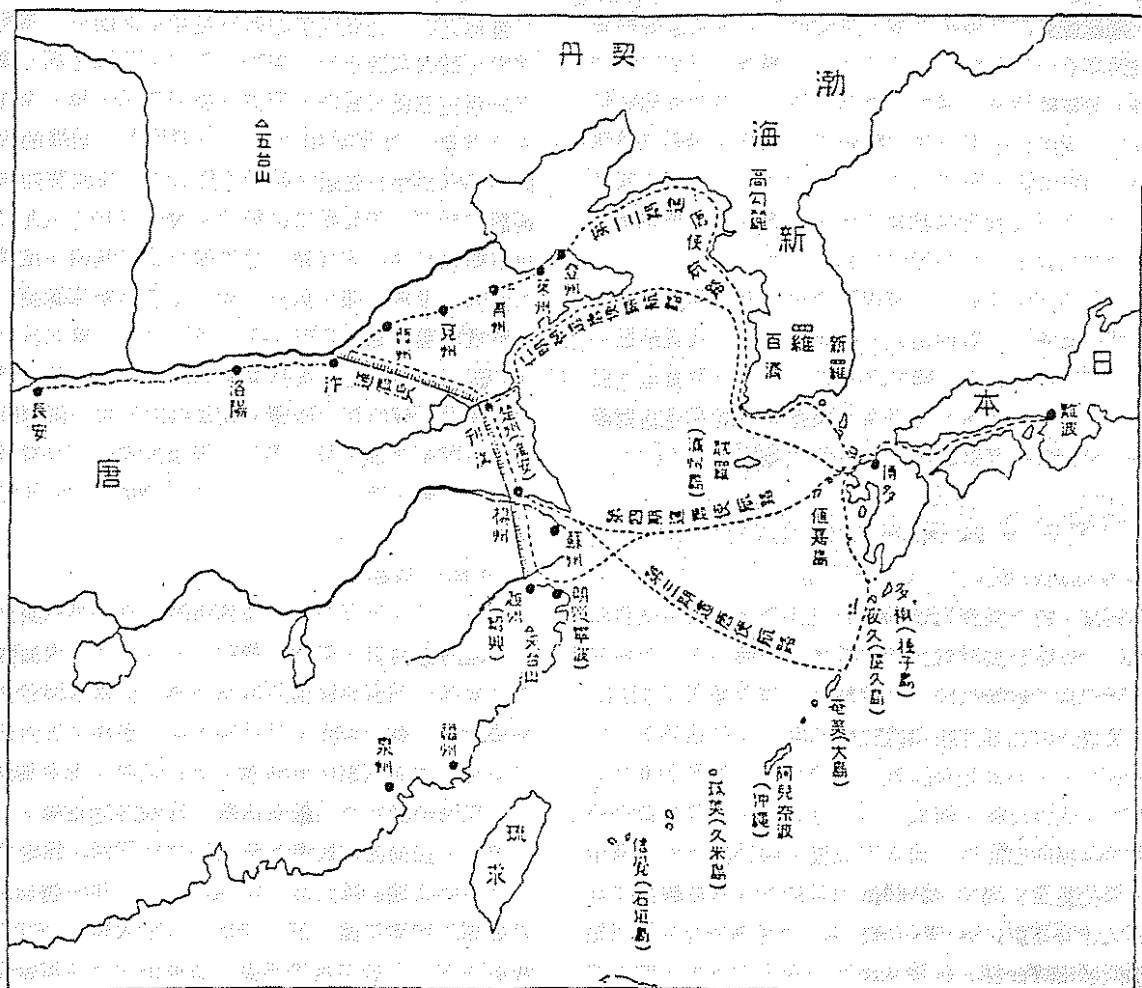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歷史沿革與州城之建置

明州，又稱之為慶元府，或寧波府。（南宋寧宗慶元元年改置慶元府。明洪武十四年，避國號諱乃改稱之為寧波府，寧波之稱謂即沿襲至今）秦漢時，為會稽郡的句章、鄞、鄞三縣，六朝時沿而未變。隋開皇九年（五八九）併餘姚、鄞、鄞入句章縣，隸於會稽郡。唐武德四年（六二一），析句章分置姚州、鄞州；七年（六二四）廢姚州為餘姚縣，八年廢鄞州為鄞縣，而隸屬於越州。開元二十六年（七三八）以鄞縣置明州，統鄞、奉化、慈溪、翁山四縣。天寶元年，改明州為餘姚郡，肅宗至德二年（七五七），復為明州。代宗廣德二年（七六四），以台州象山縣改隸明州，大歷六年（七七一）省翁山縣。五代時改鄞縣為鄞縣，復增置定海縣，宋熙寧六年（一〇七三），復析鄞縣置昌國縣。一州六縣之行政單位，大致上從此確立，直至南宋寧宗慶元元年，昇州為府，而改稱之為慶元府，其疆界更沿不變。明州，由秦漢會稽郡的三個縣城，至唐而置州，於宋乃確立一州六縣的行政區域。此一方面顯示中國漢唐之際，地方政治的演變，使其地方行政單位愈來愈細密。另一方面，或也反映出當時江南的開發，致而人口增加，使得原來的行政單位，已不符實際需要，分縣設州乃勢所必然。

開元二十六年，始置州時，州治初置於鄞江上流的小溪鎮（舊貧縣治），長慶元年（八二一）刺史韓察以州治北臨鄞江，地形卑隘，請移州治於縣治，乃移之於三江口，去舊城而城新城，此即明州城子城興建之始（註4）。子城周圍四百二十丈，外環以水，有門三，前為奉國軍門（又曰譙樓），奉國軍門內有一重門，稱之為州樓（慶元時，又稱之為慶元府門）。州樓前有一街橫過，街之兩端



圖1 中日交通圖



，爲子城之東、西二門，子城相當狹小，爲州治廳堂府庫之所在，對於地方上無捍衛之功能。唐末，明州屢受賊寇之侵擾，州民雖出錢出力，浚溝樹柵，以保衛鄉土，但以無城障衛之故，難以拒敵。僖宗末，刺史黃晟，乃率鄉民築羅城。五代時，吳越據州，由其子弟出鎮州城，又予以增壯，然其規制仍未宏備。宋統一後，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曾鞏受詔，繼續增築完成，從此明州城之羅城始具規模。

羅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，計十八里，其西南爲它山之水，東則奉化江，北爲慈谿江環抱。形成天然的城壕，形勢相當險要。城門共十，東爲靈橋門、來安門（又稱爲市舶務門，惟船貨入則開）、東渡門；東北爲漁浦門，北爲鹽倉門（又名下御、和義門，於潮入時閉）、達信門；西北爲鄞偃門（又名永豐門）；西爲望京門（或名期京門

）；南爲甬水門；東南爲鄞江門。其中望京門及甬水門，並設有水門以通漕運。而鄞江門、漁浦門、達信門，至宋寶慶年間已閉而不開，來安門及鹽倉門則各負特別之用途，爲船貨及運鹽之專用城門。故城內以東渡、望京、靈橋、甬水、鄞堰門爲要，乃明州城通往定海、昌國、慈溪、奉化諸縣的交通要道（註5）。

明州城，似以夯土築城，而有所謂「沙城歲歲修」之語（註6），故歷代守宰，常須致力於城牆的修護工作，以免城牆塌廢，尤其宋室南遷之後，爲防備金人南侵，更大事整修羅城，以加強其防禦功能。如子城之奉國軍門，於慶曆、慶元、嘉定、嘉熙年間，曾數次修葺。州樓，亦於嘉熙二年（一二三八）予以重建。至於羅城部份，則以寶慶、開禧年間的修整，最爲完備。寶慶二年（一二二六），刺守胡 更建望京、靈橋二門，於其他樓門城郭部份

，則予增高築厚（註7）。寶祐年間（一二五三～一二五八），制置使吳潛又增拓舊城，設雉堞、立巡鋪以備巡警，開慶元年（一二五九）又鼎創望京、鄧堰、下御三城門之門樓，並修繕甬水、靈橋、東渡三門，城樓乃燦然煥新（註8）。元進佔中原以後，驟毀天下城池，城郭乃為民居所佔，致成坦途。至正八年（一二四八），方國珍寇亂台州，十二年浙東都元帥納麟哈刺，以台、慶二府密邇為鄰，恐遭寇亂波及，又築城以為備（註9）。

從上述明州城池郭之興廢經過看來，唐末為禦賊寇而始築羅城，南宋之為防備金人，而大加繕修，及元時雖一度墮廢，至正年間為備方國珍之寇亂，乃又興復城池。似皆說明「築城」的目的，主要在於保衛城內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，城之負有軍事功能，是再明顯不過了。

### 三、明州城繁盛之因

#### （一）國際航線的轉變

明州城，於唐長慶元年始建於三江口後，由一個濱海的小漁村，漸漸發展成為浙東地區重要的轉口港，到南宋開慶年間已是「生齒浩繁，閭閻填溢」的大城市了（註10）。其繁盛之因有其外在和內在的因素，今試述於下。

明州城，由於其地理位置，唐時即為一重要的港口，唐武德時稱之為鄞縣，即取「貿易」之意，可見其與海外交通貿易開始的相當早。唐中葉以後，明州城漸漸成為中、日、韓的重要交通港，其關鍵原因即中、日航線的改變。據日人木宮泰彥之研究，唐時日本之遣唐使可分為四期，前二期和隋時一樣，多沿「北路」到中國大陸。即先至百濟，再橫斷黃海，到山東登州文登縣赤山真瑯口；或沿高句麗西海岸北上，至遼東半島之東岸，再橫過渤海灣，於登州登陸。第三期（八世紀）以後，多沿「南路」到唐，即由九州筑紫之值嘉島（今平戶島）南下，經南島群島（今琉球群島）的夜久（屋久島）、奄美（大島）附近，橫渡東海而達於長江口附近；或由值嘉島附近直接橫斷東海到長江口。比較兩者，北路近而安全，南路遠而多險阻，其捨易就難，實有二個原因：一為朝鮮半島形勢的轉變。原來半島上之百濟，高句麗皆與日本親善，為中日間之橋樑，約當第二期（六六〇～七〇〇）時，高句麗、百濟先後為新羅所滅，而新羅與日本不和，阻斷中日間之交通，故日本船舶不願經過新羅海面，乃改行南路。二為此時之日本，亦恰臣服了南島諸島，使其可經由此等島嶼來華。此後，又由於航海知識之進步，由九州之筑紫利用東北季風，直航我國江浙海岸，順風時，十日可至淮河口之楚州鹽城，長江南岸之揚州、明州（圖1，註11）。總之不

論是因為新羅橫礙之故，或因航海知識的進步，日人自改行南路之後，乃發現了如何利用季風之助力，高麗商人、使節也隨之取道于南，宋時，明州、高麗之間，順風時往來只需五日便可抵岸，雙方之交通甚為便捷，來往之商船自也增加。明州城始立之際，即因中日航線的改變，使明州城成為中日交通之要港（註12）。宋開寶四年於廣州始設市舶司，後又置市舶於杭，淳化三年（九九二）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，翌年雖又徙回杭州，咸平二年（九九九）復於杭州、明州分置，以「聽蕃官從便」。於是「餘杭四明，通蕃互市，珠貝外國之務，頗充於中藏云。」（註13）明州之與杭州並駕齊驅，成為浙東重要之貿易港，實由於錢塘江之沙渾，使當時之船舶不願冒險航行，而改由明州登陸之故。南宋以後由於秀州華亭縣及澈浦之興起，元時，明州之為杭州外港的地位。已大不如前（註1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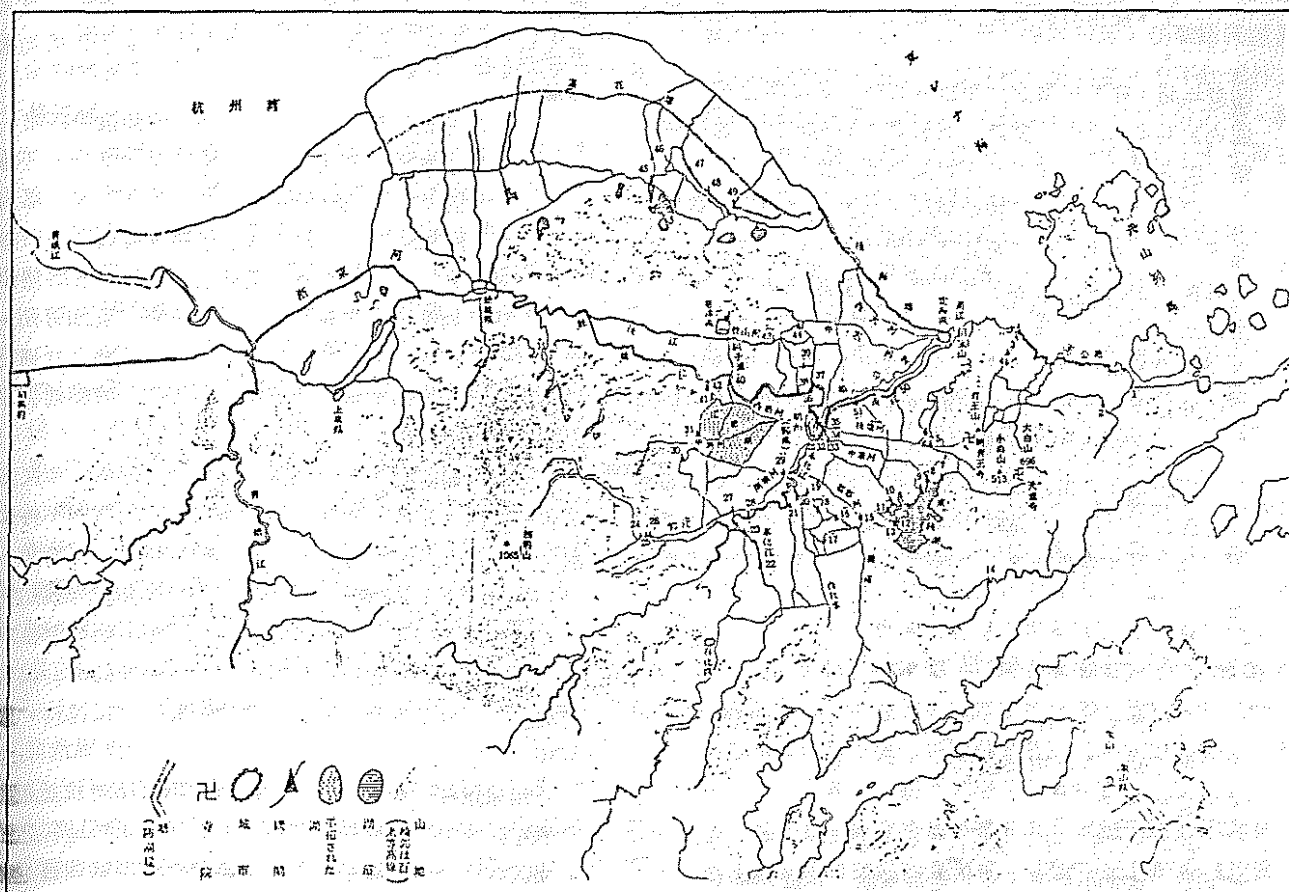
#### （二）地域的開發

明州城，除了外在形勢的轉變，提供其發展的機會外。地區內之開發，使民生豐裕，人口增加，也加強了其發展的條件。四明地區由於地處海濱，江水受潮汐影響，「滲漉斥鹵，侵近城境，沉城基土薄，劇深才五六尺，則已見塗淖，常與鹹潮伏流通決，天時稍旱，池井皆鹹不可食，沿江民畝數萬頃，鹹氣蒸曝，苗稼為之枯槁。」（註15）因此，如何解決居民之飲水及灌溉問題，為地方繁榮刻不容緩的問題。唐大曆六年（七七二）縣令儲仙舟即首先開廣境內的廣德湖，以蓄大雷山系的水源，貞元元年（七八五）刺史任侗又續予增修，其灌田面積四百餘頃。太和六年（八三二）刺史于季友於四明山下，開鑿河渠，引山水入諸港，築仲夏堰以蓄之。次年，縣令王元暉，復於上游它山嶼處築它山堰，使鄞江與其支流（後鑿為南塘河）斷而為二，沿渠築行春磨、烏金磨、積瀆磨，導它山之水，沿南塘河入甬水門，而注入城內日、月二湖。又浚暢日、月二湖及其支渠，使其脈絡貫通全城，如此則「可澗可湘可載可沿」（註16），於城居生活增色不少。並於東渡門旁築食喉、氣喉二磨，使城內之水，東則經此二磨洩於江，西則出西門與城外廣德湖相銜接，使四明山系與大雷山系之水源連接成一氣，於平衡供需區內用水方面，更加靈活運作。它山堰及廣德湖之水利工程，灌田面積達數千餘頃，不僅解決了縣西南七鄉的飲水、灌溉問題，更奠定明州城發展的基礎。

東部平原七鄉之水利，則賴於東錢湖之整治。東錢湖湖廣八百至一千餘頃，為境內最大之湖。位於東部平原之中心，受納育王山、天童山、小白山之水系，唐時灌田面



圖2 宋代甬江流域的水利開發



積約八百頃。天寶三年（七四四）縣令陸南金開掘湖旁之佔地，浚廣湖水，使灌溉面積達百萬餘頃。宋天禧中（一〇一七～一〇二一）郡守李夷庚又續予浚治。嘉佑中（一〇五六～六三）乃於湖旁設硨閘，並築前塘、中塘、後塘三運河以通奉化江、甬江，如此即可控制水位，以免江水倒流，可減水旱及鹽鹵之害。東錢湖之整治，使東部平原成爲四明地區之「穀倉」。

沿海一帶，因受海潮之影響，地多鹽鹵，無法農作。宋慶曆七年（一〇四七）乃造餘姚海塘，王安石爲鄞縣令又築王公塘，淳熙十六年（一一八九）縣令唐叔翰又築定海石塘。這些水利設施，使得沿海之鹽地變爲農田。再如宋寶佑間（一二五三～五六）守相吳潛整治慈溪縣境之水利設施，疏浚餘姚江之支流後江、中大河、青林河等，並設硨閘，引水灌溉縣南之農田，於沿海地區之開發亦促力不少（註 17，圖 2）。

地方之繁榮，除修築水利工程，以灌溉田畝，增加生產外。交通之改善，亦是重要的課題之一。明州地區之開

發，首先即得力於浙東河之開濬。浙東河大約始開鑿於六朝之時，唐時加以疏濬，成爲聯絡浙東地區之南北幹道（註 18）。浙東河之通航，延長了大運河之航線，使明州可與北方之消費中心相銜接，對明州地區之發展有莫大之影響。南宋時自明州至臨安，更遍設驛亭傳舍，史謂「道路無壅，前此率視如傳舍。」（註 19）。開慶時，守相吳潛修砌州城至杭州之西塘路。開慶四明續志，卷二載道：

郡自望京門以西，繇慈溪，接虞姚，經稽陰，趨錢塘，近數百里，行李舟車鱗集，輻湊門之外，自水仙廟望春橋，至高橋西渡，塘堤壞，過者危之。……命將佐措置修砌西塘路，共三千六百六十丈，橋二十二座，水溝五所。……周道如砥，君子所履，塗之人皆歌頌之。

由於出慈溪，經虞姚而至蘇、杭，是境內北往京城之交通幹道，開慶時除了修治西塘路外，又另闢新路，以疏解舊道之負荷。同書卷二「慈溪新路」條載道：

自慈溪縣東郭夾田橋，東取謝家隘，王家店橋，至

朱家衙西渡頭，驛路跨十五里，計二千三百一十六丈，用石板築砌，路闊七尺，……命以新路扁之。

開慶年間，守相吳潛之大事整修明州、京城間之驛道，此固由於其本人之勤政愛民，另者實由於南北之交通日趨頻繁，陳舊之道路已無法符合實際需要之故。

明州城除了北往可經餘姚江、浙東河或驛道與蘇杭地區聯絡外，西南溯鄞江可達于四明山麓，仲夏堰及它山堰之修築，使江船可直達于仲夏堰，交通甚為便利，東則泛甬江出海到舟山群島，可利用風向和潮水漲落之間來往，堪稱便捷。此外淳佑六年（一二四六），制帥集撰顏頤仲復疏浚江東西塘路，民船可沿塘往來於桃花渡與定海縣間，使東境之交通更加便暢（註 20）。

四明地區，由於境內各項水利工程之興修，及交通路線之改善，使地方日趨繁榮。宋室南遷以後，由於密邇京城，乃「行李舟車鱗集，輻湊門之外」，而成爲一通都大會了。

#### 四、明州城的發展及其規劃

明州城，自唐中葉之始置至南宋，依其發展情形，約可分爲三期，今就唐末五代、北宋、南宋三個時期之發展，分述如下：

唐開元二十六年（七三八），以鄞縣置明州，時置州治於鄞江上流的小溪鎮，由於地形僻陬，長慶元年（八二一）刺史韓幹乃移州治於三江口，去舊城而城新城，州治之初始，只爲一周回四百二十丈之子城。當此初立之際，如何解決境內之飲水和灌溉問題，爲繁榮地方之要件。縣令陸南金之開濬東錢湖，及儲仙舟之開闢廣德湖，使耕種面積增加百萬餘頃；刺史于季友及縣令王元暉之整修仲夏堰及它山堰之水利，不僅使城內居民之飲水、用水問題得到徹底解決，且富灌溉、航運之利，奠立了四明地區繁榮之基礎。明州城初建時，並無羅城，由於位處三江口，賊寇乘船而來，極易遭到侵襲，僖宗末，刺史黃晟，乃率鄉民築城，此後歷五代、北宋，乃成爲一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，有城門十之城牆。明州城自唐末之移建，到北宋初之始完羅城，可說是奠基期。

北宋以後，承唐時之發展基礎，四明地區已屬繁庶之區，明州城亦漸成爲浙東地區之重要海港，日、韓船舶之取道於明，使明州之地位更加重要。淳化三年（九九二），徙兩浙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，翌年隨即徙歸杭州，然咸平二年（九九九）又於杭州、明州各置市舶司。此後並移市舶務於州城東南，政和七年（一一一七）由於高麗使節

來往甚密，爲充裕招待之經費，郡人樓昇乃請廢城西之廣德湖爲田，收歲租以補費用之不足，並置高麗司，稱之爲來遠局，以備接待之用。寶慶明志卷六敘賦下「高句麗」條載道：

自是王徵王運王熙修職貢尤謹，朝廷遣使亦密，往來率道于明。來乘南風，去乘北風，風便，不踰五日即抵岸，明州始困供頓。……政和七年，郡人樓昇，除知隨州，陞辭建議，于明置高麗司，曰來遠局，創二巨航百畫舫以應辦三韓歲使，且請墾州之廣德湖爲田，收歲租以足用。既對，改知明州。

從上引文中可見，由於航海技術之進步，中韓之交通已甚爲便利，明州雖困於接待之費用，必也因此帶動地方上各行各業之繁興。

此外，繼前期之各項水利工程之後，歷任守宰又先後興建王公塘、餘姚海塘、定海石塘，使沿海諸縣不再受鹽鹵之害，盡地利，與海爭地，是此期發展之一項特色。然以史料所限，我們很難確切的檢查此時明州城發展的情形，且由於建炎四年（一一三〇）金人南侵，明州城被攻破，「虜遂焚其城，惟東南角數佛寺，與僻巷居民，偶有存者。」（註 21）故今僅就第三期之發展，予以述論，以見一斑。

南宋以後，由於遷都杭州，東南地區頓時成爲經濟、政治的首善之區。位於三江口之明州城，由於地利之關係，成爲蘇杭地區重要的外港，而區域內之農漁業產品，也藉此銷售到杭州或海外，其商業貿易自然更加繁盛。此時之地方建設，除了不斷維護前期之水利工程外，區域內之交通，尤以州城到杭州之間交通的改善，最令人注目。如前述開慶時，守相吳潛之整修西塘路及開闢慈溪新路，實爲舊有的道路已不堪負荷之故。而淳佑年間之疏浚江東西塘路，使州城與沿海地區之聯繫更爲密切。除了區域內交通之改善外，城內更因人口增加，爲使居民來往更爲便利起見，而大事修建橋樑，寶慶志中所見之橋樑爲乾道圖經所見，約近三倍之多。其各廂橋樑增加情形，試列表如下：（註 22）

	乾道五年（二六九）	寶慶二年（一二二七）
東北廂	6 座	24 座
東南廂	11 座	42 座
西北廂	13 座	24 座
西南廂	13 座	31 座
計	43 座	121 座



在短短不到六十年之間，橋樑增加如此快速，足見此時城內發展之蓬勃。

南宋明州城，人口增加、房舍密集的情形，我們從民宅到處侵街佔衢之情形，亦可略見端倪。寶慶志卷三坊巷條述道：

此邦生齒既繁，侵冒滋多，甚至梁水而楹，跨衢而宇，往來間阻，與馬尤病。紹定元年正月，東北廂火，救焚者束手無措，既而掘視古溝，率在居民臥室之內。……令下禁塞水衝者，食喉氣喉兩礙，橋浦不許立屋，凡街衢巷陌經火者，悉從釐正而並渠之，人以湫隘為詞，猶戶捐以數尺之地。

如上所載，由於人口增加，城內之溝渠、硨闐都為居民所佔，一遇大火，致束手無措，此似為城市發展後常見之現象。又如淳佑三年（一二四三）由於居民佔據子城之城壕，搭蓋浮棚阻礙漕運，制守陳塏只得給予酒錢，請違建者拆除（註23），此外寶佑間，羅城上也因「郡人有憑城而樓觀者，巡徼之途塞焉」（註24），如是，除了溝渠外，城牆壕池也都處處為人民所佔了。再者，凡前為寺廟等所在之地，一遇火害，如未能迅速復建者，亦多為民宅所據。（註25）城內房舍密集，充塞於溝渠巷道，一遇火害，自然難免波及附近地區。明州城內，曾於嘉定十三年（一二二〇）及紹定元年（一二二八）遭到祝融之虐，前者波及於子城以南半徑二里的方圓範圍，後者則焚毀了東北廂及其附近建築。兩次大火皆發生於十三世紀初葉，此與明州城之發展當有某種密切之關係。

明州城，除了城內處處人滿為患外，城外地區隨著城市的擴張，亦漸漸從農地變為住宅區，甚而成為樓店之商業區。寶慶時，城東南靈橋門外，已出現甬東廂（註26），開慶時，城外除了甬東廂外，尚有府西廂（註27）。城外隨著人口之繁衍，亦有跨河佔衢之情形發生。寶慶志卷十二渠堰硨闐條下載：

江東硨闐，縣東城外半里。淳佑二年，秘閣修撰陳塏守郡日，據士民白劄子：本府江東米行河，舊有硨闐，……四五十年以來，兩岸居民節次跨河造棚，汗穢塞塞如溝渠然，……。

城外不僅宅舍林立，有些地方也漸趨繁盛，而為主政當局劃為樓店務地。寶佑六年十二月，曾因市民控訴，有私將樓店務地轉賃於人，白收貨錢者，而陳述其事實道：

已行下諸扁抄具，及會紹興府例給由發下府西甬東兩廂挨究，總計二萬四千四百六十四丈六尺一分四釐，比紹興經界實虧五千四百六十五丈六尺四寸八分六釐。然紹興經界初不具府西甬東二廂也，今除

府西甬東所得之數，比紹興經界實虧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七丈一尺二寸九分六釐（註28）。

寶佑時雖加計甬東府西二廂之樓店務地，仍較紹興經界時少五千四百六十五丈六尺四寸八分六釐，如不計城外二廂時，則實虧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七丈一尺二寸九分六釐。反過來說，寶佑時，甬東府西廂之樓店務地應為七千七百五十一丈四尺八寸一分。則城外之發展亦相當可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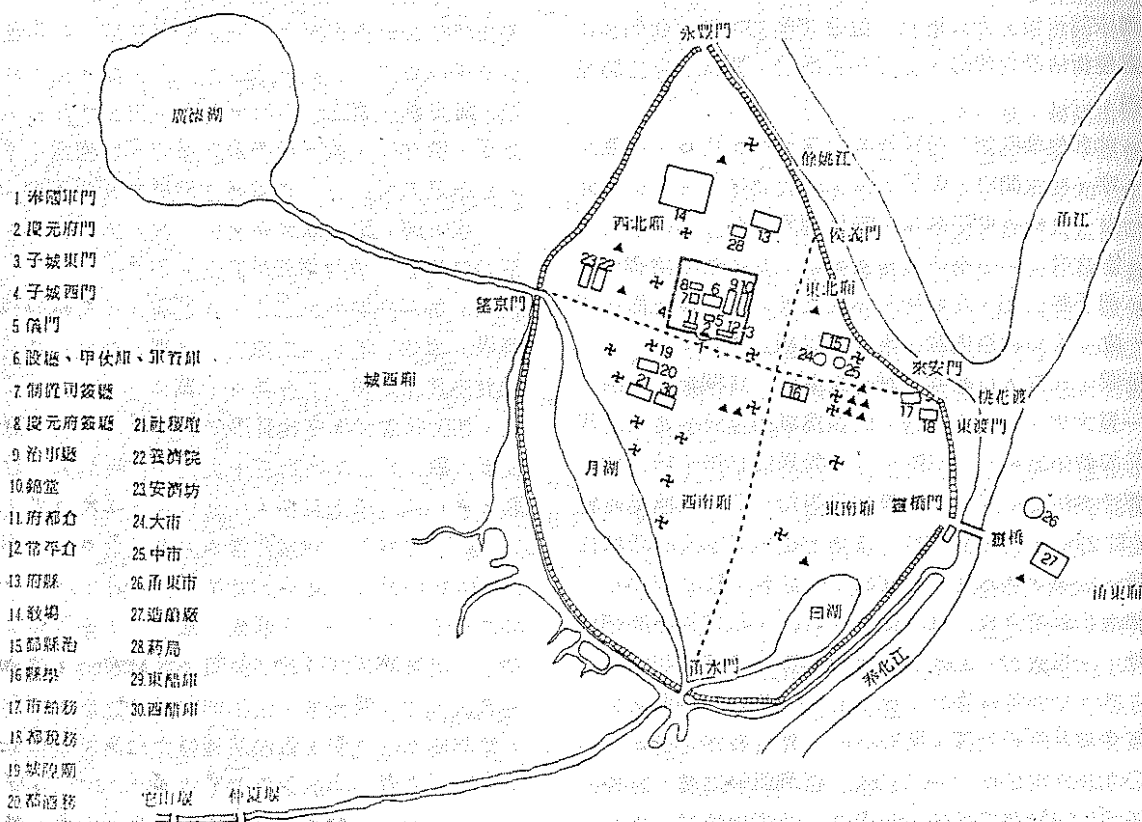
南宋時，明州城房舍密集，其人數據寶慶志卷十三敘賦戶口條載，城內坊郭戶五千三百二十一，口九千二百八十三，每戶平均不到二人，其記載之不符實際情形，應無疑異，淳佑二年（一二四二），郡人魏峴於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言中却道：「今城中十萬戶」（註29），則似嫌誇張。如就開慶元年守相吳潛賑濟市民的記載，城內外六廂受賑人數，共二萬四百三十九人，扣除城外二廂，城內受賑者為一萬七千七百多人。如以受濟人數為全人口的三分之二計（註30），則城內當有三萬人之譜，合計城外二廂則約略為四萬人。此外如就每戶五人計（註31），前述坊郭戶五千三百二十一，當為二萬五千人至三萬人間。以此項估計與賑濟人口映證，則明州城於寶慶、開慶年間約在三萬人左右。明州城，雖不能與繁華之臨安、紹興相比擬，然其據水陸之便，為四明地區之政治、經濟中心，於南宋之際，堪稱一中級之都市（註32）。

明州城，始建於唐長慶元年，其城內的公廨宇舍，坊巷規劃，於唐時已初具規模。宋統一後，於城內建置，多沿其舊。南宋時人戶浸溢，各坊只剩坊表標示，已無實質之意義。宋時於城內設廂，以為治安之單位，紹定元年大火，東北廂全毀，火後制守胡榘重新規劃整理，今所見南宋之明州城，即屬此次規劃後的面貌。

城內設四廂五十一坊，分屬於鄞縣武康鄉小江里，及東安鄉白檀里兩行政單位。從東渡門到望京門，甬水門到侯義門之間，為城內東西、南北二軸線之所在，以此區劃為東北、東南、西北、西南四廂。城北為行政中心，子城內置有府治之設廳、治事廳、制置司簽廳、慶元府簽廳、及府都倉、常平倉、甲仗庫、軍資庫、常平庫、公使庫等。子城西北設有教場，東北則立府學。子城東，為鄞縣治所，縣學則設於縣治之西南。城東之東渡門裏為都稅務，旁為市舶務，蓋由於東渡門位處桃花渡（三江口旁）之後，為來往船舶必經之地。靈橋門外設有東醋庫，子城西南美祿坊中，則為都酒務及西醋庫，掌管城內酒、醋之釀造及專賣事務。城外甬東廂，設有造船廠，為公營機構，每年由溫州等處採購木材，以海舶運送於船廠打進之後，供四明地區官府或民間之需要。城西門內設養濟院、安濟坊



圖3 南宋明州城相關位置圖



，府學旁設有藥局，皆為公設之福利機構，以照顧城內鰥寡孤寡、窮困無依者（註33，圖3）。

城內之駐軍約二千五百多人，營舍共十區，分散于城內各處，其中以子城東南天慶觀前駐紮最密，大概由於東南廂，正位衝三江口，易於受到敵人侵襲之故（註34）。城內寺廟林立，除靈應廟、純德廟等少數廟宇在城北外，較大之寺觀，多半建於城南，尤以西南廂月湖畔為甚，如廣福水陸院、聖功院、崇教院、寶雲院、延慶寺等。此由於月湖又稱之為西湖，湖內有十洲三島之勝，以風景優美著稱，向為騷人墨客吟詠讚賞之處（註35），故月湖一帶，除廟宇外，又多深宅大院，為城內之高級住宅區（註36）。

城內鄞縣前之大市、中市，城外甬東廂之甬東市，為市民日常購物的地方，此外各城門外有朝市，鄰近之村民，多到此販賣鮮魚生果，供應城內居民衣食所需。除此，沿街衢要道，亦多樓店、市廊，有各種之飲食店、用品店、大商行及戲園子等。其詳細情形，略述於後。

## 五、明州城的商業活動

明州城，除為四明地區之政治中心外，更是區內之經濟中心，又因其海港的性質，遠洋舶貨亦多經此轉運，故其城內的商業活動，可分就遠程、中程及地區性三類。

如上所述，明州地區自唐中葉以後，因日舶之南來，已漸漸成為中國大陸前往日、韓地區之重要交通港。宋以後因日、韓使節或商人不斷南來，而有市舶司及來遠局之設置。日、韓之交通貿易，使高麗之人參、麝香、藥材等，日本之木材、硫磺（註37），於明州市舶司抽解後，即可於城下售賣，或經浙東河運至蘇、杭等消費中心販售。其中以日本之木材最為有名，此或因其地處北寒，木堅而直之故吧。寶慶志卷六敘賦下市舶條：

日本即倭國，地極東，近日所出，最宜木，率數歲成圍。

日本木材之大量輸入中國，乃使「四明臨安，倭船到時，用三十干，可得一佳棺。」（註38）此外境內天童山景德寺之千佛閣、阿育王山之舍利殿、白蓮教寺院，及杭州徑

山之承天寺，皆曾受日僧之捐贈良材，而修建完成（註39）。木材原屬質重而價輕之物，宋時臨安、四明地區多見日本之良木，可見當時雙方來往之頻繁，海上運輸之進步了。

除北面之日韓船舶外，南方之海南、占城、西平、泉廣州等船，亦常沿中國南岸而北上。其多載各色香料、染料、藥材等來售（註40）。明州城內有「波斯團」，可見當時波斯商人循南線而來商販者亦不少。而珠江三角洲之稻米，亦多從廣州海運至明州城，再銷售於鄰近之鄉鎮（註41）。

明州除負有蘇杭及四明地區轉口港之性質外，區域內之農漁產品、手工藝品亦多會集於城內，交換銷售，以互通有無，或者即經此而轉售於蘇、杭地區。由於區內地形之複雜，居民之生業各有不同，多數人日常生活所需，均須仰賴外來物品。如境內之東部、中部多平原，其物產以稻作為主，為州境土民所仰食。然因富豪上下操縱屯積之故，致使境內常須從浙東、浙西或兩廣進口糧食。東部沿海一帶，如定海、昌國、象山縣境則多漁貨之利，所產魚、蝦、蚌、蟹、海藻、紫菜等，種類繁多產量豐富，為唐時上貢之佳品。西南地區，多丘陵山麓，產物以竹林、木炭、茶葉、水果為主。從上綜述，可見境內居民皆難以自給自足，多須仰賴外來產品，因此沿各河流支渠與山麓交接之處，或海船交通必經地區，即林立著許多市集，以為當地貨物之集散中心。如鄞縣境內之下莊（寶幢）市、小白市、東吳市、下水市、橫溪市、韓嶺市，皆在縣之東部及東南山區，出產竹炭柴木、筍菜等。而奉化縣內之南渡市、泉口市、袁村市、白杜市，除身兼「山市」的性質外，少數因地處通往浙西的西南道上，而為來往客商宿泊之所。北方慈溪縣之黃墓市、大隱市，亦為通往餘姚客商必經之地，而漁溪、藍溪、門溪三市則以出產當地之魚蝦為主。而象山之弦歌市，亦為當地居民與外商交換之所（註42）。各地之農產、海產、山產由外地商人於各市集收購後，多半送往城內，再經此而銷往蘇杭地區或附近之村莊。如境內之海鮮、鯊、腊、鱈等水產，多半銷於江浙地區。夢梁錄卷十二載道：

明、越、溫台海鮮，魚、蟹、鯊、腊等貨，亦上通于江、浙。

同書卷十六又載：

姑以魚鯊言之，此物產于溫、台、四明等郡。

四明地區之魚產售於杭州，從夷堅續志卷一所載高宗時遺失扇子的軼事，可見一斑。

建炎中高宗幸四明，嘗執一摺疊扇。中有玉孩兒為

扇墜。金人至，登舟倉卒，失手沈扇于江。及都杭州十餘年，忽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，手執一扇墜玉孩兒。上熟視，乃向年四明所沈者。遂問循王得之何所。答曰：「臣于清河坊鋪家買至。」上即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，謂于每日提籃者得之。遂轉問提籃者，乃謂得之候潮門外陳宅廚娘。繼又問之廚娘，答云：「破黃花魚，重十斤，腹中有此一物。」奏聞，上大悅，以為失物復還之兆。鋪家、提籃者各與進議校尉，廚房仍誥封孺人。

從這段頗富趣味的故事看來，四明地區如網獲高級魚類時，多半銷往杭州地區，如引文中之十斤重的大黃花魚即是。海產外，境內東部平原盛產草席（註43），所產之草鞋、草席除自用外，草席亦流通全國，聞名遐邇，稱之曰「明席」。又如奉化之純，輕密如蟬翼；象山之「女兒布」，質地細白，亦頗受全國各地之歡迎。此外，境內山麓產茶，年產額達五十一萬四百三十五斤（註44），其著名者有「白茶十二雷」，亦為區內重要商品之一。明州城處於區內貨物的集散中心，城內有「花行」、「竹行」、「鹽蛤橋」、「鯊團」、「西上團」、「後團」等大商行，當為上述產品收購貿易的中心。東城外半里，江東碼頭處，有「米行河」、「米行橋」，應是區內主要米市所在地，東部平原之稻米由此銷往境內鄉鎮，廣東、浙西地區運來之食米，或也經此而轉售於鄰近村莊。至於少數之外來物品，也有於城內加工再出售於附近地區者，如前述明州因與日本交通貿易之故，而多良材佳棺，城內應之而起者，即有「棺材巷」。而「油車巷」、「鑄冶巷」等，其性質亦與之近似（註45）。

城內，除了為區內之貨物集散中心外，隨著城市的發展，人口增加，其日常生活所需，亦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問題。城內鄞縣前之大市、小市，城外甬東廂之甬東市，皆屬固定的市場，販售各類生活必需品。各城門外之朝市，多鄰近村民到此販賣鮮魚生果，乃有「草市朝朝合」之語（註46）。而嘉定六年浙江提刑程覃攝慶元府事，其上尚書省之劄子亦道：

竊見慶元府乃瀕海之地，田業既少，往往以興販鮮魚為生，城市小民以挑賣生果度日，理宜優恤。（註47）。

此種因城市發展，而使小販鱗集的現象，似為古今中外不變的定律。城內由於商業日益興盛，於原有市場之外，主要街道旁，商店櫛比鱗次，呈現一片繁榮景象。如紹興年間（一一三一～一一六二）所經界之樓店務地長二萬九千九百三十丈二尺五寸，並細分為三等九則，其中「能仁



寺前寺廊」、「貫前巷口寺廊」，皆屬上等九則之地，可能即為市區的商業中心（註48）。開慶時，城外甬東、府西二廂，其樓店務地長達七千七百多丈，附郭地區亦漸繁盛，其商業日趨發達，致而由城內擴展至城外，為城市發展之顯著現象。

### 結 論

唐宋之際，江南地區，承六朝以來之安定，又由於隋之開鑿大運河，促進南北的交通，使南方之經濟日漸蓬勃，人口逐漸增加，已有凌駕北方之勢。安史亂後，北方由於經濟殘破，藩鎮割據，帝國唯賴東南財富以供軍政之需，因此開發江南，建設江南，為唐室苟存的唯一途徑。四明地區始設州於唐開元二十六年，隨即境內即展開各項水利、交通建設，其發展正足以與上述歷史潮流相映證。

明州城其始乃為地方的政治軍事中心，然建城後，由於浙東河之疏濬及中日航線的改變，使其成為浙東地區重要的海港。宋室南遷，由於密運京城，乃為蘇杭地區之轉口港，及境內農業品的集散地。城外坊廂及樓店務地之出現，足見其商業性已涵蓋軍事性。明州城之發展，使我們瞭解中國地方都市的多樣性。

明州城之發展，雖只為唐宋之際江南地方城市發展的個案，然我們相信其絕非孤證，而是一項普遍的事實。

### 註釋：

- 註1：斯波義信：「宋代明州の都市化と地域開發」待兼山論叢第三號 一九六九、十二
- “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”收入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.391~439, 1979.
- 註2：鄞江、奉化江、甬江皆屬同一水系。蓋鄞江為奉化江之上游，奉化江流至三江口，北合慈谿江，始稱之為甬江，東流入海。見清周道遵甬上水利志卷六，鄞江條。四明叢書第三輯第三冊，中華大典編印會印行。
- 註3：參看王洸中國海港誌第四章第七節，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。
- 註4：雍正寧波府志以代宗大曆六年（七七—）移州治於三江口，建子城。乾道四明圖經及寶慶四明志則載長慶元年（八二—）刺史韓察始移州治於縣治，築新城，即為後之子城。兩者之說，不知孰是，今姑從後者。
- 註5：參看宋羅瀋寶慶四明志卷三城郭條。宋元地方志叢書八，台北大化書局影印咸豐年間版。
- 註6：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八，頁28。宋元地方志叢書

八。

- 註7：寶慶四明志卷三城郭條。
- 註8：宋吳潛開慶四明續志卷一城郭條。宋元地方志叢書八。
- 註9：清曹秉仁寧波府志卷八城隍。中華叢書。
- 註10：開慶四明續志卷一坊巷條。
- 註11：參看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，七卷，第六章第一節「遣唐使の四期」，頁二九～一三三；及第四節「遣唐使航路」，頁一四一～一五四，東京金刺芳流堂出版，昭和二年再版。
- 註12：據木宮泰彥之研究，日本遣唐使廢絕後，西元八三九至九〇七之間，中日往來船舶之出發港及登陸港如下：

唐→日	明州	楚州	松江口	廣州	台州	不詳	計
出發港	6	1	1	1	1	14	24

唐←日	明州	楚州	溫州	常州	福州	不詳	計
登陸港	1	2	1	1	1	7	13

- 參看前引書第七章「遣唐使廢絕後の日唐交通」，第一節「商船の來往」頁一九四～二〇三。
- 註13：宋史卷八八，地理志三。
- 註14：參看藤田豐八「宋元時代海港としての杭州附上海膠州」，史學雜誌二十七編九、十號，一九一六。
- 註15：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，卷四，頁四，河渠條，宋元地方志叢書九。
- 註16：寶慶四明志卷四郡志敘橋樑。
- 註17：參看寶慶志卷十二鄞縣志敘水，開慶續志卷三水利。
- 註18：浙東河之開鑿年代不詳，然唐時已有堰埭之設置，於其岸旁並興起草市，可見已具航運之利。參看日野開三郎「唐代堰埭草市の發達」，東方學33輯，昭和42年。
- 註19：開慶四明續志卷二驛亭橋路。
- 註20：寶慶四明志卷四敘水、津渡。
- 註21：寶慶四明志卷十一車駕巡幸條。
- 註22：寶慶四明志卷四橋樑。
- 註23：寶慶四明志卷三子城。
- 註24：開慶四明續志卷一城郭。
- 註25：寶慶四明志卷十一敘祠，如城內之景德寺、西壽昌院、天封院、大中祥符寺、藥師院皆於嘉定十三年受火害後，即廢為民居。

註26：寶慶四明志卷三郡志坊巷條，造船場下註「城外一里甬東廂」。

註27：開慶四明續志卷七樓店務地，卷八賑濟。

註28：開慶四明續志卷七樓店務地。

註29：宋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，四明叢書第三輯第三冊。

註30：據梁庚堯之研究，南宋農村戶口的社會結構，其中客戶約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間，而官戶約佔千分之三至百分之一之間，其他則屬主戶。主戶中又分上戶和下戶，下戶約佔主戶的百分之九十。客戶和下戶多屬貧農階級，其約佔總戶數之九十以上。南宋城市的社會結構，至今尚未見到有系統之研究文章，難以斷定其貧下戶到底占城內戶口的百分之幾。然城市之經濟情況應較鄉村為佳，且開慶年間之賑濟，為一般例行性之恤貧，非因特別之災荒，故保守之估計，其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參看梁庚堯「南宋農村戶口概況」沈剛伯八秩榮慶論文集，頁一一一～一五〇，台北聯經，一九七六。

註31：據梁庚堯之統計，南宋每戶平均人口在三·七一至七·四之間，有四分之三在五口以上，約有一半平均在六口前後。參看前引文。

註32：參看梁庚堯「南宋城市的發展」，食貨十卷十、十一期，一九八一、十。

註33：參看寶慶四明志卷三坊巷。

註34：寶慶四明志卷七禁軍廂軍。

註35：參看乾道四明圖經卷八，詠西湖十洲等詩。

註36：參看張時徹嘉靖寧波府志卷十六宅第，中央圖書館藏本。

註37：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，據載日本之商貨雖有細色：金子、砂金、珠子、藥珠、水銀、鹿茸、茯苓，及麤色：硫黃、螺頭、合草、松板、杉板、羅板等。然開慶四明續志卷八「蠲免抽博俵金」却道：「倭人冒鯨波之險，舳艫相銜以其物來售，市舶務實司之，然藉抽博之入，以裨國計，硫磺板木而已，金非所利也。」可見日中貿易，乃以硫磺木材為大宗。

註38：陸游放翁家訓，知不足齋叢書。

註39：參看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下卷，第一章第三節「貿易の有様と貿易品」頁一二～二〇。

註40：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。

註41：參看金漢昇「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」，中國經濟

史論叢第一冊，頁二六五～二九四。

註42：參看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產，卷十三、十五、十七市鎮條。黃潤玉寧波府簡要志卷三山市條。

註43：宋太平老人袖中錦（學海類編叢書）「三賤」條：「明州有三賤，燒底賤、著底賤、喫底賤，或問其故，曰：燒底賤是燈草，著底賤是草鞋，喫底賤是鹽。」又元至正四明志卷五敘產載：「甬東里民，多種席草，民以織席為業，計所贏優於農畝。」則明州不但盛產席草，也已漸漸走向商品化的途徑。

註44：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九。

註45：開慶四明續志卷七樓店務地。

註46：乾道四明圖經卷八。

註47：寶慶四明志卷五敘賦上商稅條。

註48：參看開慶四明續志卷七樓店務地。